



奈杰尔·汉密尔顿 著 王振西 主译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

肯尼迪传

昆仑出版社



THE LIFE OF JOHN F. KENNEDY

BY ROBERT F. KENNEDY JR.
WITH AN AFTERWORD BY THE AUTHOR

肯尼迪传

ROBERT F. KENNEDY JR.

肯尼迪传

——无悔的青春——

奈杰尔·汉密尔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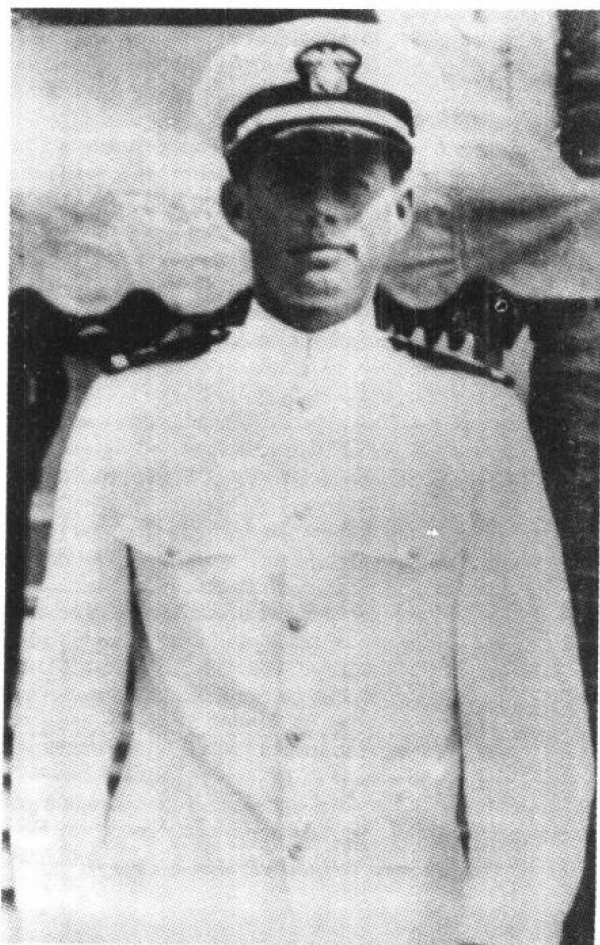
王振西 主译

(下)

昆仑出版社

■ 第八章 ■

参加美国海军 *JOINING THE U. S. NAVY*



· 8 ·

PART

海军少尉情报官约翰·F·肯尼迪于 1941 年 11 月。摄
于华盛顿特区

第八章 参加美国海军

代拟讲话提纲

在父亲的催促之下，杰克赶在他留在斯坦福的最后一天，找来一位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记下了他本人的口述，以完成对父亲的承诺。在前言中，他向父亲解释说，这篇文章“仅仅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我无意于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杰克声明在先，“因为我并不清楚你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另外，我认为文中应适当加入一些你在英国的经历，以增加趣味性和真实性。”

文章开头非常严肃：

11月6日，即选举后第二天，我辞去了三年来一直担任的驻英国大使一职。在公开发表的辞职声明中，我曾表示，今后将尽全力帮助总统，使美国免于参战。这也是我一贯的主张。

基于这个原因，我决心为美国人写下我对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信念。

这些信念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把它处理得更对广大美

国民众的口味呢？对此杰克不敢多言，直接切入了父亲理念的核心之处：

就我本人而言，我一直认为，外交之术神秘莫测。一般人倾向于把外交当成马基雅弗利牌，认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参与其中，正是这种倾向，造成了在过去悲剧性的岁月里，民主国家陷入软弱无力的境地。如今，期望当权者采取激烈有效的措施与独裁者相抗衡已属无望，因为他们既已被一种虚假的安全和满足感所蒙蔽，就非得等到心神俱裂的最后一刻才能幡然悔悟。

相对于这些盲目自满的领导人，杰克认为，大使应该以一种头脑清晰、思想合理、条理清楚的民主党人士的姿态出现。“我的观点不太中听，我的心情沉重。自1938年9月以来，我一直处于这种沉重抑郁的心境之中。可能美国人并不乐于听这种悲观论调，但请注意，1935年到1939年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遭受相同的待遇。当时大家觉得他是个到处散布灰色思想的讨厌家伙。”杰克写道，希望父亲与丘吉尔沾上关系，借此抬高父亲。

但与丘吉尔相提并论并不能让这位前大使脱离与张伯伦狼狈为奸的印象，也不能改变他认同慕尼黑和谈的背景。“我认为，慕尼黑和谈在我国朝野所引起的反应，正足以证明缺乏足够的信息所造成的危险十分严重。”杰克写道，力求扭转形势，让舆论对父亲有利。但他不得不在这里用括注加入一些给父亲的建议：“爸爸：你可以在这里加入一些你

自己对慕尼黑事件的看法及其背景的说明。即，如果当时爆发战争会对美国有什么严重危害；美国的防卫体系会像英国一样完全垮掉；由于英国完全缺乏防守，被轰炸一夜之后就有可能投降。这样，美国就将完全暴露在危险境地。至此，你可以得出结论，对美国来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欧洲和平，所以，你支持张伯伦。”

然而，杰克心里很清楚，这只能说明部分情况。大使和张伯伦私交颇深，他史无前例地参与了英国内阁事务，他不断利用贝当将军企图与希特勒求和。所有这些行为，并不能仅以约瑟夫认为英国和美国并未准备好参战为藉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本人不认为美国在经济上有理由或有道义参战，这也是他本人 1917 年逃避服兵役的原因。

杰克已经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也知道在提纲里不能避而不谈。如今这种指控已经摆在公众面前，杰克代表父亲承认：“我的确是个失败主义者，也是个绥靖主义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在他们的专栏里声称，90% 的美国人不能接受我的观点。”

为向父亲解释为什么自己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到了艾尔索普和金特纳访谈所引起的非议，杰克又用括注的形式插入了下面一段话：

你必须随时记住，你要摆脱“绥靖主义者”这个头衔。在我看来，一旦这个词和你联系上了，眼前必会丧失所有努力的成果，虽然从长远观点看，你可能是正确的……不论是孤立主义者还是主和者，没有人愿意被称作绥靖主义者……绥靖主义这

个词自然是始于慕尼黑和谈，其产生的背景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要对独裁者让步，就可在争议中获得一个满意答复。但你不能把自己的观点根植在向独裁者让步的基础上，你得从别处着眼。我认为林登伯格之所以造成大众的反感就在于，他宣称我们不在乎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我们能跟独裁者统治的世界和平共存——至少，他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

其实，这也是肯尼迪大使给人留下的印象。但与林登伯格不同的是，肯尼迪对战争本身怀有更为深刻的厌恶。“我认为最好的角度应该是反对独裁统治，你当然不相信民主制度可以和独裁政体和平共存，你个人的背景使你不能容忍独裁政体——你憎恨独裁统治——你是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迹的——你希望能保存这种生活。但你认为要想保存民主制度，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免卷入欧战。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像干涉主义者那么痛恨独裁统治，而是因为你更爱美国。”

这真是个漂亮的幌子。但是杰克替父亲架构的框架有诸多漏洞，而且越抹越黑。三年来，作为美国驻欧洲首席外交官，肯尼迪大使对记者发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讲话，还有他那些不谨慎的言论和信件，所有这些都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以至于就连他忠实的儿子也帮不上忙了。杰克于是又建议说，“当然，必须提到的是，你认为英国可否抵挡一阵，如果可以，可以抵挡多久。”杰克想到几周前，父亲在加州发表的失败论调，又提醒说，“你不必像以前那样直接预言，而是声称这得视德军的实力而定，你甚至可以夸口说，你知

道狂轰乱炸并不能让英国退缩。”

杰克本能地意识到，如果父亲真想和丘吉尔相提并论，必须摆脱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名声：

谈到对你悲观泄气的指责——你最好声明你也不愿这样悲观，大谈事情是多么令人高兴更为容易，而你只是希望能对国家有一定帮助。你认为英法两国的乐观主义者给他们的国家帮了不少倒忙。但这并不表明，你认为事情只能越来越糟。

我认为你得表现出对未来抱着希望的态度，否则人们会说：好么！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断定我们注定失败。你要说明，正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英国陷落），你反而能够正确面对现实。

为了把这一点说透，你还可以说，在进入外交界以前，你亲眼见过太多的乐观主义者被股市淘汰——自那以后，你又见过许多乐观的政治家摔下政治舞台。

杰克意识到，人们很可能会指责他父亲在股市使用诡计，曾导致几次股市跌落，而他在外交方面也曾经故伎重施。即使是声称自己一直是正确的，也最好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否则就很容易遭那些自以为是的专栏作家的讽刺挖苦，他们会说，你不是真的想要帮助美国人民，你只不过是标榜自己的正确罢了。至于艾尔索普和金特纳，你根本没有必要与他们正面交锋，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随时可以和你周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十年后，乔·艾尔索普居然成了杰克亲密的白宫朋友。而就在杰克宣布就任美国总统的那天晚上，杰克不仅以客人身份出现在艾尔索普位于乔治敦区的摆满古董的美丽的家中，更在那里与女主人做出了通奸之举——尽管表面上他们都称彼此是朋友，但他有意以此来报复这位曾参与破坏父亲政治生涯的人。

1940年12月6日，杰克匆匆赶完这篇有关绥靖政策的讲话稿，并立即把它寄给父亲，好让他在白宫外面对记者宣布，卸任之后，先稍事休息，“然后，我将全力投入我认为在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业中去……帮助总统，让美国免于参战。”

援助英国

在启程前往洛杉矶的里弗塞德之前，杰克心里很清楚，他并没有替父亲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写信给他：“给你们家老头子传个话……就说这里有许多人都支持他的反战立场，”并且呼吁大使“组织一个‘反战委员会’，其口号是‘美国优先’，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美国免于参战”。杰克的朋友托比·麦克唐纳也赞同，甚至大加吹捧大使的观点。但杰克本人却反应冷淡。临行之前，当他再次试图与弗利普·普赖斯上床时，他意识到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是不可调和。

“杰克，亲爱的……我想告诉你，我并非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冷静’，”后来弗利普在一封告别信中坦白承认，“有时你挺难对付的，最后那两个晚上就是极好的例子——但你

其它很多方面弥补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杰克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替父亲洗刷失败主义和绥靖主义的罪名，但他意识到，比父亲名誉更需要维护的是民主制度，而当时，唯一为保卫民主制度而战的国家就只剩下英国了。

于是，在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班机飞往洛杉矶的途中，他拿出纸笔，“以有关该文的一点补充”为题，对父亲唱起了反调。他小心翼翼地开了头：

亲爱的爸爸，在我看来，我们给英国提供的实质性援助太少了，而他们要求提供更多飞机的防务计划也被搁置……现在的美国似乎正处在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英国所处的思维模式之中，正如慕尼黑和谈唤醒了英国民众——五月的一系列事件也唤醒了我们。但和英国人一样，我们也同样在漫不经心地重整军备——值得注意的是，根本就没有通过真正的立法来加强国防。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如此自信的原因在于：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受侵犯——我们是安全的，尤其是看到英国坚持了一个夏天之后。但我们并未看到，如果英国由于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援助，而被迫投降，那我们也会像英国当年一样，被打得措手不及。英国正是认为1938年不会发生战争，没有好好利用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这段缓冲时间来加强战备，因而遭受了惨重的挫败，同样地，我们也可能会无法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

那么，这一点似乎影响了你的观点。但我认为，你同样相信应该援助英国，建议美国不卷入战争，不应以不向英国提供足够的援助为代价。假如我们不给英国提供足够的援助，并敦促国会和整个国家行动起来，向英国提供它目前所需的一切援助——在我看来，其危害就和我们现在参战一样大，况且，它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一旦英国被打败，美国就会在这个紧张而敌对的世界里孤立无援。几年之内，它会被迫为每年的国防开支付出高昂代价——以维护装备——它可能会陷入战争——甚至可能有被各种极权统治击败的危险。

那时，人们的态度就会彻底转变，他们会问“那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么笨，不尽量向英国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呢？为什么我们如此短见，要担心钱呢？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立法来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全力以赴支援他们——假如 1940 年，经过表决，国内的国防开支是 130 亿美元，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援助英国的准备——他们的确是我们国防力量的一部分（谈到给英国的贷款——最好指明每一分钱都没有被滥用——它们都花在这个国家上了——这就好像在为公共事业投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人们却经常意识不到）。

就像现在我们迁怒于那些让我们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如海因斯·佩奇等人一样（但综合考虑，参战可能是最佳选择），将来，人们也将指责

那些在 1940 年到 1941 年的关键时期，没有指明援助英国之重要性的人们。

这是一则不中听但衷心的警告，是一位年仅 23 岁的儿子对父亲提出的可贵而感人的劝告。“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应该主张打仗，”杰克补充说，“但你可以着重阐述援助英国至关重要这一观点。你可以指明，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会采取行动，而在没有眼前威胁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危机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眼前所面临的威胁，虽不是立即被侵犯，但英国却可能会因为缺乏我们的援助而陷落。尽管形势危急，要求美国行动起来，但调动起全国人民积极性的希望渺茫，因此，你感到心情沉重。”他又回到了父亲的观点上：

当然，没有人想要打仗——反战情绪目前是最流行的——但当初张伯伦和其他人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最后却还是被迫参战——将来回首往事——我们也可能会对自己的懈怠感到震惊。

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既然你认为应该援助英国，就应该明白表达出来，你应该竭力去除《时代杂志》给你贴上的绥靖主义者和反对援助英国这类标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早期生活中最为关键而最具影响力的信件。在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眼里，约瑟夫·P·肯尼迪大使成了美国孤立主义的代表

人物。当时，伍德将军即请求这位前大使担任正在酝酿中的“美国优先、反对干涉”运动的主席。与此同时，小乔终于在哈佛组成了“反对军事干涉委员会”，“旨在反应哈佛大学绝大多数学生反对美国卷入欧战和亚战的心声，”并在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中指出，此项运动的宗旨，是为了敦促美国“建立一个固若金汤的半球防卫计划，并只允许在有限范围内给英国提供工业和经济支持”，而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援助“都是不明智的”。

杰克敢于向父亲和兄长的失败主义观点挑战，表明在过去一年里他有了长足进步。为了使口气缓和一些，他掩饰说，“我说了你们一直在说的话——只是我感觉有些部分你应该再强调一些罢了。”他在信的末尾写了西海岸的最新社会消息：

杰克·莫菲特的婚礼于昨天举行。非常有意思的是——似乎所有的旧金山人都在那里，我得这么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你竟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每个人都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因此我猜想，虽然有一些人读了那些专栏文章，注意到这一点，但更多的人根本没读过。克拉伦斯·林德——那位在赫斯特报社逐渐崭露头角的记者——一直在对你大加赞扬，我认为那是恰如其分的。

最后他以表达爱意的话，以及“我正要去参加圆桌会议”的消息，结束了这封信，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租 借 法 案

如今，是否为英国提供援助，成了美国国内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其中心是罗斯福 12 月 7 日宣布提交国会审议的《租借法案》。

与此同时，为期五天的“里弗赛德会议”云集了来自西海岸的专家学者，讨论援英问题。当时正值英国孤军奋战轴心国的历史性关键时刻，与会专家学者知识渊博的有关演说和辩论自然精彩。来自雷德兰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丹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米尔斯学院、内华达、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们济济一堂。大会的主旨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法西斯，甚至主张干预主义。查尔斯·马丁教授在他的开幕词中宣称，“到孤独的民主国家战胜强权侵略者的那天，人们必将发现他们的命运与保卫人类精神的斗争息息相关，因而乐于‘为自由付出巨大代价’。”道格拉斯·米勒教授在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问题的评论中，谈到了“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能否取得和解”的问题，他从《幸福》杂志中摘录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民意测验，说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商界行政主管认为，美国可以通过调整自己来与获胜的极权国家打交道。米勒表示，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无知，完全不顾目前纳粹苛刻的贸易合同本质。合同规定必须使用德国船只、德国保险公司、德检察官来履行合同。他们甚至要求美国公司在签署一项条款时，注意“此合同系遵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原则签订的。”米勒强调说，“每一项贸易中都被赋予了政治、军事、

社会、文化上的宣传意义，这是缔约人在谈判时，从未想到过的。”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小国跟第三帝国签订合同时，还需附上他们公司员工的名单。这种做法，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除了参加会议之外，杰克还为其中四场研讨会起草供公开发表的摘要报告，这四场研讨会分别是：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研讨会、西半球经济合作研讨会、英国文明研讨会及和平建议计划研讨会。杰克在有关战争和未来世界经济研讨会的摘要报告中，强调恢复“双边贸易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建立集体安全”，这个先决条件必须要求“美国采取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同时，重新反思美国一战后的孤立主义立场。在总结有关“英国文明”的讨论中，杰克也仔细记录了林登·马厄的有关评论：“与30年代初的形势相比，近期工党力量有了非同寻常的增长。考虑到战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其增长具有特殊意义……还谈到了大不列颠王国的战后局势……曼德教授认为，美国提供安全的义务有助于加强这样一个思想，即：真正的安全，只有各国能在一个新世界秩序中结合才有望获得，而他此前在学院中就曾提出过这一观点。同时，他再次强调美国在未来世界中将扮演极重要的角色，而只有协助促成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才是达成世界新秩序的最佳途径。”

在杰克所有的摘要报告里，都以呼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为重点，尤其是在《关于和平的建议计划》的摘要报告中这一点更为突出。“大会主席（南加州大学的尤金·哈利博士）……强调指出美国不加入国联的错误，导致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